

文化与社会赞许反应：社会个人互动的观点

赵志裕^{1,2} 邹智敏³ 林升栋⁴

(¹ 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新加坡) (² 伊利诺大学心理系, 美国)

(³ 北京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871) (⁴ 厦门大学广告学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处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时, 常用的两种方法为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我们在本文中提出另一个观点。通过回顾近期的相关文献, 我们指出: 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 反映在不同社会环境中, 人们在相应的文化要求下, 以不同的自我呈现方式来加强他们追求个人目标的动力。这种社会、文化与个人的对话历程乃研究文化—心理关系的核心课题。用实验或统计方法将因这个历程产生的变量从跨文化数据中剔除后, 所得的结果便只有微薄的文化意义了。因此, 我们反对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噪音。相反地, 我们认为跨文化研究者应认真地分析社会赞许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 以社会赞许反应作为一个窗口, 管窥社会、文化与行为相生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 社会赞许反应; 跨文化研究; 自欺自播; 印象管理

分类号 B841; B849:C91

1 前言

社会、文化与行为相生相成: 它们互相转化, 互相促进, 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因此, 要了解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不得不探讨社会和文化对思想与行为的影响; 要掌握社会和文化演化的路径, 不得不了解人们如何塑造、摸索、认识、传播和改造他们身处的社会和文化。由是之故, 社会、文化与思行间的关系, 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的重点课题。为了穷究社会、文化与行为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界的鸿儒们上下求索, 为揣摩社会、文化与行为的共衍开辟了跨文化心理学这条进路, 成为社会心理学一大旁支。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旨趣在通过比较人们在不同文化氛围中, 其思想行为的同异, 藉此评定文化的心理影响。当某种行为呈现颇大的文化差异, 便说明那种行为的文化特殊性; 当某种行为只存在微弱的文化差异, 便说明那种行为的文化普遍性。

要作有意义的跨文化比较, 必先要确定采用的测量工具在不同文化中, 具有等同的概念与计量特性。如果采用的测量工具在甲文化测量概念 A, 在

乙文化测量概念 B, 利用这工具作跨文化比较, 所得的结果便无效了。同样, 如果采用的测量工具在甲文化和乙文化中具不同的计量特性, 研究者也不能直接比较甲文化和乙文化在测量工具上的得分 (Chen, 2008)。由于梁觉在本刊中已详述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本文便不在此着墨了。

在本文中, 我们提出在跨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种考虑: 当不同文化的被试, 在回答问题时, 出现不同的作答行为时, 研究者应如何理解这问题? 以社会赞许反应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为例, 在 2005 年, AC Nielsen 访问了来自 38 个国家的 21,000 人对食物营养的了解。研究发现: 美国人在评价自己对食物营养的了解时在各国中得分最高。可是当被问到一些基本食物营养知识时, 美国人的得分却比很多别的国家低。例如, 只有 58% 的美国被访者知道饱和与非饱和脂肪间的分别; 在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 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访者知道这个分别。这结果说明美国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 比南美被访者有较强的自欺自播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倾向。可是, 中国被访者也有作出不尽不实的回答的倾向。AC Nielsen (2005b) 在另一

项调查中,访问了 3000 名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居民。当问及到药店买保健药品时,会否考虑医生给他们的意见,85%的被访者表示过去到药店买保健药品时,他们最重视医生给他们的意见。可是,这些被访者当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曾在过去 1 年到药店购买过保健药品。这些被访者可能在从事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为了给访问员一个重视健康,听医生话的良好印象,作出不尽不实的回答。

当来自不同文化的被试作出不同的社会赞许反应时,跨文化研究者应如何处理这问题呢?若从跨文化研究的进路思考这问题,不同文化的被试作出不同的社会赞许反应,会造成测量不等同(measurement non-equivalence)的危机,祸及文化比较的效度。因此,社会赞许反应被视为一种扰乱视听的噪音(noise),需要采用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把它隔离和剔除。

我们在本文中指出:跨文化研究者既不能、也不应采用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来控制社会赞许反应。我们会以中美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为例,说明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处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首先,因为美国的社会和文化长期包容甚至鼓励个人肯定和表达自己的长处,对于美国被试,自欺自擂已成为了一种不易受实验操纵影响的自动作答惯势(automatic response set)。因此,要借采用实验设计隔绝社会赞许反应对美国被试回答的影响,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反映出在不同文化中,社会调节(social control)和人们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个人自利动机的基本模式。因此,文化与社会赞许反应间的关系,应是跨文化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为了保障测量等同,勉强采用统计方法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隔离剔除,其实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在以下数节中,我们会先描述中美被试在社会赞许反应上的差异和中美在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的主导模式。跟着,我们会阐述中美被试在社会赞许反应上的差异如何反映中美在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差异的主导模式。最后,我们会讨论采用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来控制社会赞许反应的困难。

2 中美文化在社会赞许反应上的差异

社会赞许反应是指被试在回答问题时,夸耀自己的某些个人或社会特质,例如夸耀自己的能力才干、标榜个人奉公守礼的美德。社会赞许反应可以

是刻意造成的,例如有些被试为了给研究者留下良好的印象,刻意地强调自己的某些优点。社会赞许反应也可以是不自觉的反应,例如有些被试缺乏自知之明,真的觉得自己有过人之处,便在作答时不经意地夸大了自己的长处。为了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而刻意强调自己的优点,称为印象管理。因缺乏自知之明而不经意地夸大了自己的长处,称为自欺自擂。两种社会赞许反应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Paulhus, 1984)。

对文化与社会赞许反应间的关系,前人已作了不少理论探索(杨中芳,赵志裕,1998; Chiu & Yang, 1997)。系统的实证研究,在近期有了较快速的发展。这些研究发现:人们越重视集体主义(认为完成集体目标比追求个人目标重要),便越多从事印象管理;同时,人们越重视个人主义(认为追求个人目标比完成集体目标重要),便越多从事自欺自擂。由于集体主义在东亚社会较普遍,而个人主义在北美社会较流行,因此,与北美社群相比,东亚社群(包括中国社群)有较普遍的印象管理趋向,和较弱的自欺自擂趋向(Lalwani, Shavitt, & Johnson, 2006; Lalwani, Shrum, & Chiu, 2009)。要了解这文化差异的成因,必须先了解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的主导模式。因此,在下一节中,我们以中美为例,说明社会、文化与自我表现间的关系。

3 中美文化在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的主导模式

在本文中,我们视文化为一假设性构念(hypothetical construct),它所指的是世代相传的知识传统(Chiu & Hong, 2006, 2007)。当一代人将一个知识传统的内容传到下一代时,某些内容会因为不合时宜而被淘汰。在遇到急剧的社会变迁和频繁的文化接触时,即使在同一年代中,知识传统的内容也会出现新陈代谢和明显的蜕变。文化传统的蜕变,说明人们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检讨文化内容能否适应时代,去芜存菁,并从其它知识传统汲取营养,更新传统文化。

上述观点包含着几个重要的命题。一,社群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群中的成员(例如:华人)对其最广为流传的知识传统(例如:中华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Chiu & Chen, 2004; Wan et al., 2007; Wan & Chiu, 2009)。当人们认同其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时,

便会作出那种知识传统要求的行为。可是,当人们不认同其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时,他们便只会在感到有文化压力时,才会作出那知识传统要求的行为(Chiu & Kim, in press)。例如:在华人社会占主流的中华文化,要求人们在表现自己时中和谦厚。认同中华文化的华人,不管在人前人后,都能做到不亢不卑。可是不认同中华文化的华人,却只会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文化压力下表演得温和恭厚。二,在同一社群中,除了最广为流传的主流文化外,可能还流传着多个别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与主流传统或并行不悖,或互相竞争(Hong, Wan, No, & Chiu, 2007)。三,文化承传是具适应性的。没有一个知识传统能在所有社会中超越其它知识传统,一个在某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传统,到了另一个社会,因为不能适应该社会的环境,可能找不到市场(Chiu, Young, & Wan, 2008)。

多阶选择论(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 Heylighen & Campbell, 1995; Sober & Wilson, 1998; Chiu & Chao, 2009)特别强调文化承传的适应性。在生物演化历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将自己的基因复制的物种,便能更好地生存繁衍。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人们追求个人的福祉,能在社会中取得较多的个人利益,便更能通过物竞天择的考验。可是,当人们不顾群体利益,专注追求个人利益,社会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自利的行为,面临集体被淘汰的危机(Heylighen & Campbell, 1995; Sheldon & McGregor, 2000)。例如:农民与厂商为谋一己之利,不顾公众利益,将三聚氰氨加入牛奶中,藉此提高牛奶的含氮量,短期可以增加个人利润,但却为整个工业的生存带来严重危机。

要处理因个人谋私引起的问题,社会控制机制便应运而生。这些机制包括立法禁止损害公众利益的谋私行为。除立法外,社会还可以通过外控的社会文化压力和内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减少损人利己的行为。外控的社会文化压力指通过互相监督以预防有人作出损人利己的举动(Spoor & Williams, 2007)。内化的社会文化价值指培养人们的公平、仁义意识,使人们不愿作出谋私害众的行为。在一些社会中,支持内化社会控制的知识传统发展得比较成熟。在这些社会中,人们普遍认识社会中的文化规范,而且很多人还内化了这些规范,在人前人后的表现都不踰矩。在另一些社会中,支持外控社会控制的知识传统发展得比较成熟。在这些社会中,人们也普遍认识社会中的文化规范,但很多人只会

在遇到社会文化压力时,才肯策略性地遵守规范。

回到自我表现这问题上,研究显示,不管在中国还是北美,自欺自擂对个人的精神健康都有积极作用。自欺自擂的人,只要他们不过度夸大自己的能力和美德,都会比不自欺自擂或过度谦卑的人快乐和健康(Sedikides, Rudich, Gregg, Kumashiro, & Rusbult, 2004; Sedikides & Strube, 1997),并更能有效率地完成自己的目标(Baumeister & Tice, 1985)。这些结果说明自欺自擂能强化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能包容甚至鼓励个人炫耀自己的优点。资本主义鼓励人们谋划个人的福祉,反对政府或社群干预市场,认为只有让市场无形的手不受干预,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社会和经济才能最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谋取利益、也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并支持能配合个人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行为:包括自欺自擂(Chiu & Kim, in press)。

当然,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处理因谋私而损害公众利益的问题。如前所述,可以用来处理这问题的社会控制机制包括立法、互相监察和内化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干预市场是非不得已绝不采用的下下招。互相监督是通过家人、亲友、邻居和同事们互相监督、预防和检举因追求私利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密集,人们聚居在一小块土地上,守土重迁,居住与职业流动性都偏低,互相监督是成本效益较高的社会控制机制。可是,在人口密度低、居住与职业流动性高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有效地推行互相监督制度十分困难。因此,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倚赖内化文化价值来降低因追求私利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些社会倡导公平、人权、和平等机会,强调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必须公平地对待他人,不能侵犯别人的基本人权和追求个人福祉的机会(Dworkin, 1977)。

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也非常重视生产和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但由于中国人口稠密,劳工价格较低,较适宜采用劳工密集的生产模式。此外,为了避免失业问题造成的社会不安,劳工密集的生产方式,成为了中国经济生产的主流方式。在劳工密集的经济体系中,人与人有紧密的互倚,个人的行为对社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大,维持社群中的和谐合作关系更形急切。因此,在不损害个

人能动性的前题下, 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和社群间的和谐, 一方面鼓励人们积极上进, 一方面压抑个人因过度嚣张地突出自己的优点而破坏和谐。因此, 中国的主流知识传统, 一方面强调人们要有自信, 在私底下, 要相信自己有良好的素质和能力, 因为这份自信能提高人们积极上进的能力。另一方面, 也强调在公众场境中, 人们虽然不必低贬自己的价值, 但却要表现得敦厚谦恭, 不亢不卑(Chiu & Yang, 1997)。

因此, 中国社会面对的社会控制难题, 是如何在不降低损害个人自信的前题下, 让人们在公众场合中, 抑制褒扬自己的倾向。由于中国人口密集, 居住和职业流动性较低, 互相监督成为了成本效益较高的社会控制机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确保社群中的人不会作出越轨的行为。互相监督可能演变为集体惩罚文化: 在这文化中, 人们互相举报不轨的行为, 甚至惩治疏漏职守、没有举报亲邻不轨行为的人(Chiu & Hong, 1992)。有时, 集体惩罚文化还会被制度化, 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中的连坐法, 便是集体惩罚制的极端例子。简言之, 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促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在鼓励发挥个人能动性, 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 也重视集体主义和社会和谐, 不鼓励人们因褒扬自己的长处而惹起公众的非议。

上述的分析, 已得到多项研究结果支持:

1) 在文化价值的比较研究中, 综合过去数十年的研究结果, 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较重视集体主义, 而美国社会则比中国社会较重视个人主义(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

2) 在自我调节上, 和美国社会相比, 中国社会较重视满足社群对个人的期望。别人的期望, 也是中国社会趋人克己守礼的动力(Chiu, Dweck, Tong, & Fu, 1997; Chiu & Hong, 1997; Hong, Ip, Chiu, Morris, & Menon, 2001; Wang, Wiley, & Chiu, 2008)。反之, 和中国社会相比, 美国社会更重视公平、人权和平等机会。这些文化价值也是在美国社会中调节个人行为的重要社会控制机制(Chiu et al., 1997; Hong et al., 2001)。

3) 在自我调节的动机上, 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都强调争取得益(promotion)多于避免损失(prevention), 说明发挥个人能动性、争取得益在中美都很重要。可是, 和美国社会相比, 中国社会较重视避免损失, 较不重视争取得益(Chen, Chiu; Roese, Tam, & Lau, 2006; Lalwani et al., 2009; Zou, Tam, Morris, Lee, Lau, & Chiu, 2009)。这说明中国

社会较重视争取得益和避免损失两者间的平衡。

4) 低居住流动是集体主义形成的原因: 集体主义在居住流动高的地区比在居住流动低的地区较受重视(Oishi, Lun, & Sherman, 2007; Oishi et al., 2007)。

5) 高人口密度和低职业流动是人们重视满足社群对个人期望的原因: 和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比,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 人们较重视满足社群对个人的期望(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此外, 和在职业流动高的地区相比, 在职业流动低的地区, 人们较重视满足社群对个人的期望(赵志裕、区颖敏、陈静, 2008; Chen, Chiu, & Chan, 2009)。

6) 集体惩罚在中国社会较在美国社会流行。而且, 在中国社会, 人们支持集体惩罚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们觉得人们有责任和能力防止亲邻作出伤害群体利益的行为(Chao, Zhang, & Chiu, 2008)。

7) 尽管在调查中, 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较少强调自己的优点, 但他们和美国被试对自己有同样积极的情感, 说明美国被试心口如一地觉得自己有很多优点, 而中国被试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有很多优点, 但心里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Cai, Brown, Deng, & Oakes, 2007)。

8) 尽管在调查中, 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较少表示自己有优点, 但他们和美国被试同样激烈地否认自己拥有缺点(Kim, Chiu, Peng, Cai, & Tov, in press; Kim, Peng, & Chiu, 2008)。这说明虽然在中国被试不在调查中表达自己的优点, 但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有缺点。中国文化规范中不亢不卑的自我表现模式, 不容许人们褒扬自己的长处, 但也不鼓励人们贬低自己的价值。

9) 当需要公开地告诉别人对自己能力的期望时, 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谦逊。可是, 当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报告对自己能力的期望时, 中国学生并不比美国学生谦逊(Kim et al., in press)。这些结果说明, 美国被试在人前人后都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 而中国被试在人前表现谦逊, 但心底下却对自己很有自信。

4 中美文化在社会赞许反应背后的社会动机历程

以上的分析有助了解中美被试在社会赞许反应上的差别。美国社会鼓励人们褒扬自己的好处, 而社会规范也不要求人们在表现自我时谦逊, 加上人们需要自信作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动力。因此, 美

国被试较中国被试更容易忽略自己真实的能力和素质,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有很多过人之处,在调查中不经意地夸大了自己的长处。因此美国被试在调查中的自欺自擂得分较中国被试高。

近期的研究结果支持这观点。当研究者测量和利用统计方法剔除人们对争取利益的关注(promotion focus),文化间在自欺自擂反应定势上的差异便拉近了。如果美国被试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才不经意地自吹自擂,不管他们在公开还是绝对匿名的场合中评估自己的能力,他们也会同样激烈地夸大自己的能力。研究结果完全符合这预测。当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缺乏自知之明的。私我意识(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高的被试,倾向经常反省自己的能力、态度和素质,他们比较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私我意识较高的被试,不论他们的文化背景,自欺自擂的倾向也偏低。反之,倘若被试的私我意识较低,自欺自擂倾向的文化差异便很大了(Lalwani et al., 2009)。

在中国社会,人们要平衡个人积极性和社会和谐,一方面追求个人得益,另一方面避免失却和谐。因此,在公开回答调查问题时,中国被试会重视管理自己给调查员留下的印象。因此,和美国被试相比,中国被试在调查中印象管理得分较高。一旦研究者测量并用统计方法剔除被试对避免损失的关注(prevention focus),文化间在印象管理的差异便减弱了。此外,人们有不同程度的公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也就是留意别人对自己评价的倾向。在公我意识较强的被试中,文化间在印象管理的差异特别彰显。在公我意识较低的被试中,文化间在印象管理的差异并不显著(Lalwani et al., 2009)。

为了平衡个人积极性和社会和谐,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规范提示人们在表现自己时要不亢不卑。与这一文化期待相符,在调查中,中国被试不会赞同像“我很能干”这类积极的自我描述,但却会激烈反对像“我很不能干”这类消极的自我描述。最后,在无损社会和谐的情况下,中国主流文化容许人们肯定自己的能力。纵使在公开场合中,中国被试大多不会褒扬自己的能力,但当作匿名回答时,很多中国被试也会像美国被试一样肯定自己的能力(Kim et al., 2008; in press)。

5 采用传统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来控制社会赞许反应的困难

在处理文化间在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时,跨文

化研究者常用的两种方法为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实验控制是通过实验操纵,降低被试作社会赞许反应的动机。这类型的方法包括让被试作匿名回答,或修改题目,降低题目内容的社会赞许程度。这类型的方法假设社会赞许反应是一种可受控制的反应:被试会因应实验处境和题目内容作出较强或弱的社会赞许反应。这种假设适用于印象管理,但却不适用于自欺自擂。因此,实验控制可以减弱中国被试的印象管理倾向,却不能降低美国被试自欺自擂的倾向。

统计控制是通过测量和使用统计方法剔除社会赞许反应造成的影响。这类型的方法假设社会赞许反应是测量上的噪音,而统计方法就像隔音墙,能将噪音隔离。可是,以上的分析显示:文化在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反映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在相应的文化规范下,以不同的自我呈现方式来支持他们追求个人目标的动机。这些社会、文化与个人的对话正是研究文化与心理间关系的核心课题。用统计方法将这些历程从被试的反应中滤除后,所作的跨文化比较便只有微弱的文化意义了。因此,我们反对将文化间在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视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噪音。相反地,我们认为跨文化研究者应慎重地分析社会赞许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将社会赞许反应作为一个窗口,管窥社会、文化与行为相生相成的关系。

传统的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方法无法处理跨文化研究中社会赞许反应造成的混淆。可是,如果研究的目的不在评估在不受社会赞许反应“污染”的文化差异,而是在考察在中国社会或西方社会中,当人们不关注个人反应的社会赞许性时会作出那种行为,传统的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方法仍是有效的。例如,要了解当中国人不关注社会赞许时会有多愿意捐款赈灾,研究者可以测量和用统计方法剔除印象管理对捐款意愿的影响,或让被访者在匿名的场景中回答问题,以降低被访者的公我意识。如要了解当美国人不关注社会赞许时会有多愿意支持环保,研究者可以测量和用统计方法剔除自欺自擂对支持环保意愿的影响,或让被访者在回答问题前反省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以提高被访者的私我意识。因此,本文中提出论点,对处理在中国(或西方)社会中因社会赞许反应造成的混淆,也有重大的启示。

6 未来的研究方向

以上的分析,彰显了文化、社会和行为三者间

相生相克的关系。正如赵志裕与康莹仪(2009)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一书的序言提出:“为了在物竞天择的进化历程中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人们创造了文化。此外, 人们也利用文化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因此, 文化为人们服务。为了约束人们因追求私利而作出危害社群的活动, 人们制礼作乐, 通过文化规范, 把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义务制度化。因此, 文化也为社会服务。因为文化役於社会和个体的需要, 而文化的创造与繁衍又必须依赖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完成, 文化便受到社会和个人心理需要的制约。同时, 社会也会透过文化承传约束个体的行为。”

由于文化承传是社群生活和制度的产品, 也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不期然采用来作思考和处理生活问题的知识传统(赵志裕, 康莹仪, 2009), 当社会变迁出现或外来文化传入时, 本来并不普遍的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机制渐渐进入主流, 文化的内容和人们的思行也可能出明显的转移(何友晖, 彭泗清, 赵志裕, 2006)。例如, 在近代中国, 劳动市场已渐渐自由化, 由中央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渐渐淘汰, 工作流动性提高了, 法治制度渐渐稳固, 互相监察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功效也渐渐降低。在这期间, 人们可能开始不很重视印象管理, 社会中也开始多了自欺自播的行为(Chen et al., 2009)。因此, 未来对文化与心理的研究, 除了比较不同文化中的行为表现外, 亦应留意社会变迁对社会和行为造成的影响(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由于社会变迁对城市的和农村(Chen & Chiu, in press)和对不同社会阶层(Chaturvedi, Chiu, & Viswanathan, 2009)造成的影响不一致, 在研究社会变迁对文化与行为的影响时, 城乡间的差异和阶层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 可供关注这些课题的同仁参考。

7 结论

社会赞许反应的问题除了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 也是一个应如何建构文化科学的问题。在跨文化研究中, 研究者假设文化在人们心中烙印, 一个社群的平均反应, 代表着这个社群的主流文化价值和取向。因此, 通过比较不同文化, 便会发现文化的心理影响。“沔彼流水, 其流汤汤。”这思潮一直影响着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

可是, 这观点忽略了人们在生活中追求个人福祉的愿望, 忽略了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在调节个人

追逐私利的行为, 也忽略了人们面对文化压力时会采用的应对方法(Chiu & Hong, 2005)。例如: 人们会通过肯定自己的优点加强追求个人福祉的动力。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会按环境的需要鼓励或压抑褒扬自己的倾向。当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压抑褒扬自己的倾向时, 人们便需要管理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将自己恭顺的一面表达出来, 并找寻适当的方法(拒绝作自贬的自我陈述)或时机(在匿名作答时)肯定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我们提出的研究进路, 强调人们在表现自己时, 会将个人和社会要求一起考虑, 主动与文化对话, 而不会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影响。这种研究进路也将跨文化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进化论和主流心理学中的社会动机论联系起来。“沔彼流水, 朝宗于海。”百川以海为宗, 我们期待跨文化心理学这条分流, 能滚滚流入行为科学的知识海洋, 创造出一门波澜更壮阔、影响更深远的文化科学。

参 考 文 献

- 何友晖, 彭泗清, 赵志裕. (2006). *世道人心: 中国人心理的探索*.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中芳, 赵志裕. (1987). 中国受测者所面临的矛盾困境: 对过份倚赖西方评定量表的反省. *中华心理学期刊*, 29(2), 113-132.
-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 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间的关系? 共享内隐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4, 147-170.
- 赵志裕, 康莹仪. (2009). *文化社会心理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AC Nielsen (2005a), "Fat content of most concern to U.S. consumers when shopping for food" (accessed August 25, 2005), [available at <http://us.acnielsen.com/news/20050727.shtml>].
- AC Nelsen (2005b), "Chinese consumers are brand conscious when it comes to drugs and health supplements purchase" (accessed August 25,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2.acnielsen.com/news/20050512_ap.shtml].
- Baumeister, R. F., & Tice, D. M. (1985). Self-esteem and response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Subsequent performance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3, 450-467.
- Cai, H., Brown, J. D., Deng, C., & Oakes, M. A. (2007). Self-esteem and cultur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self-evaluations or affective self-regard?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162-170.
- Chao, M. M., Zhang, Z., & Chiu, C. (2008).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culpability judgment: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East Asian-North American differenc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9, 730-744.
- Chaturvedi, A., Chiu, C-y., & Viswanathan, M. (2009). Literacy, negotiable fate, and thinking style among low income women in Indi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 Psychology*, 40, 880–893.
- Chen, F. F. (2008). What happens if we compare chopsticks with forks? The impact of making inappropriate comparison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11–125.
- Chen, J., Chiu, C-y., & Chan, F. S-F. (2009).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job mobility and the belief in a fixed world: Evidence from performance foreca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851–865.
- Chen, J., Chiu, C-y., Roese, N., Tam, K-p., & Lau, I. Y-m. (2006). Culture and counterfactuals: The importance of life domai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 75–84.
- Chen, X., & Chiu, C-y. (in press).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gene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xemplary persons: The case of Chin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Chiu, C-y., & Chao, M. M. (2009).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person: Ways to personalize and socialize cultural psychology. In R. Wyer, C-y. Chiu, & Y. Hong (Eds.), *Understanding cultur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457–466).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Chiu, C-y., & Chen, J. (2004). Symbols and interactions: Application of the CCC model to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In S-h. Ng, C. Candlin & C-y. Chiu (Eds.), *Language matter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y*.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Chiu, C-y., Dweck, C. S., Tong, Y-y., & Fu, H-y. (1997). Implicit theories and conceptions of mor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923–940.
- Chiu, C-y., & Hong, Y. (1992). The effect of intentionality and validation on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6, 291–300.
- Chiu, C-y., & Hong, Y. (1997). Justice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H. S. R. Kao & D. Sinha (Eds.), *Asia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pp. 164–18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iu, C-y., & Hong, Y. (2005). Cultural competence: Dynamic processes. In A. Elliot & C. S. Dweck (Ed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mpetence* (pp. 489–505). New York: Guilford.
- Chiu, C-y., & Hong, Y. (2006).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Chiu, C-y., & Hong, Y-y. (2007). Cultural processes: Basic principles. In E. T. Higgins, & A. E.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785–804). New York: Guilford.
- Chiu, C-y., & Kim, Y-H. (in press). Rethinking culture and the self: Som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S. M. Breugelmans, A. Chasiotis, & F. J. R. van de Vijver (Eds.),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u, C-y., Kim, Y-H., & Wan, W. N. (2008). Personalit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G. J. Boyle, G. Matthews, & D. H. Salofske (Eds.), *Sa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assessment. Vol. 1: Personality theories and models* (pp. 124–144). London: Sage.
- Chiu, C-y., & Yang, C. F. (1987). Chinese subjects' dilemmas: Humility and cognitive laziness as problems in using rating scales. *Bulletin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18, 51–69.
- Dworkin, R. (1977).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lfand, M. J., Nishii, L., & Raver, J. (2006). O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1225–1244.
- Heylighen, F., & Campbell, D. T. (1995). Selection of organization at the societal level: Obstacles and facilitators of metasystem transitions. *World Future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 45, 181–212.
- Hong, Y., Ip, G., Chiu, C-y., Morris, M. W., & Menon, T. (2001).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Collective duties and individual right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Social Cognition*, 19, 251–268.
- Hong, Y-y., Wan, C., No, S., & Chiu, C-y. (2007).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323–345). New York: Guilford.
- Kim, Y-H., Chiu, C-y., Peng, S., Cai, H., & Tov, W. (in press). Explaining East-West differences in the likelihood of making favorable self-evaluations: The role of evaluation apprehension and directness of express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 Kim, Y-h., Peng, S., & Chiu, C-y. (2008). Explaining self-esteem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North Americans: Dialectical self (vs. self-consistency) or lack of positive self-regards. *Self and Identity*, 7, 113–128.
- Lalwani, A. K., Shavitt, S., & Johnson, T. (2006).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165–178.
- Lalwani, A. K., Shrum, L. J., & Chiu, C-y. (2009). Motivated response styles: The role of cultural values, regulatory focus,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 870–882.
- Oishi, S., Lun, J., & Sherman, G. D. (2007). Residential mobility, self-concept, and positive affec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131–141.
- Oishi, S., Rothman, A., J., Snyder, M., Su, J., Zehm, K., Hertel, A. W., Gonzales, M. H., & Sherman, G. D. (2007). The Socio-ecological model of pro-community action: The Benefits of resident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831–844.
- Oyserman, D., Coon, H. M., & Ki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72.
- Paulhus, D. L. (1984). Two component model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598–609.
- Sedikides, C., Rudich, E. A., Gregg, A. P., Kumashiro, M. & Rusbult, C. (2004). Are normal narcissists psychologically healthy? Self-esteem matt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400–416.
- Sedikides, C., & Strube, M. J. (1997). Self-evaluation: To thine own self be good, to thine own self be sure,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to thine own self be better.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209–26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heldon, K. M., & McGregor, H. (2000). Extrins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 383–411.
- Sober, E., & Wilson, D. S. (1998). *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oor, J., & Williams, K. D. (2007). The evolution of an

- ostracism detection system. In J.P. Forgas, M.G. Haselton, & W. von Hippel (Eds.), *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social cognition* (pp. 279–292). Psychology Press: New York.
- Wan, C., & Chiu, C-y. (2009). An 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 approach to culture: The role of intersubjective norms versus cultural self in cultural processes. In R. Wyer, C-y. Chiu, & Y. Hong (Eds.), *Understanding cultur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53–91).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Wan, C., Chiu, C-y., Tam, K-p., Lee, S-l., Lau, I. Y-m., & Peng, S-q. (2007). Perceived cultural importance and actual self-importance of values i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337–354.
- Wang, Y., Wiley, A., & Chiu, C-y. (2008). Independence-supportive praise versus interdependence promoting pra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2, 13–20.
- Zou, X., Tam, K-p., Morris, M. W., Lee, S-l., Lau, Y-m., & Chiu, C-y. (2009). Culture as common sense: Perceived consensus vs. personal beliefs as mechanisms of cultural influ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579–597..

Culture and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An Individual-in-Society Perspective

Chi-yue CHIU^{1,2}, Zhi-Min ZOU³, Sheng-Dong LIN⁴

(¹College of Busines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²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SA)

(³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⁴Department of Advertis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hen dealing with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researchers often employ experimental and statistical control to isolate and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the data. In this article, we offer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a review of the pertinent research literature, we posit that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ses may reflect how people in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ir attendant cultural expectations develop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their self to support their personal strivings. This activ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al strivings is a defining issue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research. Artificially excluding the variance symptomatic of this process with experimental and statistical controls from cross-cultural data will generate results with little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we recommend against treating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as noise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stead, we encourage cross-cultural researchers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and use this phenomenon as a window to grasp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 of society, culture,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Key words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impression management